

明代北京审美文化的生成

王 南

提 要 北京地区的审美文化中具有某些相对稳定的文化元素,明代是形成这些元素的关键时期。明代北京具有特殊的时代地域因素。随着朱棣定都和“北京”定名,明都北京在金中都、元大都、南京的文化意识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汉族的、北方的文化心理,决定了沿袭至今的北京审美文化的某些重要特征。

关键词 明代北京 审美文化 “北京文化”

—

“北京”至高无上的文化史地位,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全面完成于明代。明代的北京文化,更确切地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后的京城文化是名至实归的“北京文化”,明代是“北京文化史”的真正起点——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首府的“北京”命名于明代。就审美文化而言,一直延续到后世甚至当今的许多“京派”的审美心态和审美范式,也成型于明代的北京。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建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北京”之名仍无确指。直到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北京”作为国都第一次正式定名。“北京”定名,其中蕴含着文化形态的融合与贯通,也纪录了此处审美观念的地域化特征。从全国看,明代是北京真正成为文化、政治、军事中心的时期。正因如此,北京的审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整个明代审美文化的典范。整体而言,明代北京审美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南京”到“北京”——从因袭到明代化;第二个阶段:从“大明”到“大北京”——北京审美文化的雏形。明代的北京城雄阔壮丽,文化蕴含丰厚,展示了无愧于世界各大古都的审美风貌。而北京城的建城史告诉后人:金中都和元大都已为明北京打下了重要的形制基础,其中也包含着具有延续性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要素。

金代参照北宋汴京城的规划和建筑式样,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展而建成新城。天德五年(1153年)三月正式迁都,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名为“中都大兴府”。称为“中都”,除了与南京开封府、北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四个陪都相对而言之外,“中都”意谓天下之中。这是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对北京地区以命名的方式进行的文化中心定位。从边地进入中心,入主中原,“中都”之称便带上了占据中心的自豪感。元代的大都之名来自突厥语“汗八里”(Khanbaliq),意为“大汗的居处”,而“元大都”是这一地区的文化称谓。大都的兴建历时20余年完成了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建筑学家指出,与蒙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惯与深层意识有关,元大

都的一大特色是以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的格局,京城水域的走向决定了环水建设新城宫室的位置。按照“逐水草而居”的思路,大都的皇城以太液池为中心,周围布置了大内、隆福宫和兴圣宫三座宫殿。北城区因郭守敬开通通惠河使海子(积水潭)成了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沿海子一带形成繁荣的商业区。蒙古族长期处于游牧迁徙的生活状态中,决定了他们基本上无法形成完整的建城观念。从城市命名和建制的特点都可以看出,元大都是具有一定元蒙民族意识的都城。元蒙统治者的民族观念和习性,使他们对治下的汉族人民既有隔膜,又要迎合利用而使之臣服。同样,蒙族统治下的大都人民的心态也是微妙复杂的,从而形成了明代北京市民审美文化的心理前提。

二

如果说以北京城为中心的北京地区存在某种特有的审美风范,这种审美风范中具有某些相对稳定的文化元素,那么,明代就是形成这些元素的关键时期。北京审美特色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逐渐形成的与“大都”、“南京”的文化心理差异。

首先是京城的汉族意识。“北京”定名以后,“明北京”完成了汉族政治的主流化。汉文化的皇城意识,也形成了北京文化的物态格局。这样的意识和格局,对北京民众的审美心理发生了重要影响。明代北京人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略例》中这样陈述自己记录北京景物的心态:“地从石晋割后,不隶中土六百余年,而辽、金、元递都之,故奇迹异闻,事多三史。编中为表旧事,不尽删削,退夷进夏,深用恍然。”^①从五代石敬瑭割地燕云十六州至明代以前,异族的“三史”为北京汉族人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痕,“退夷进夏”是典型的汉人心理,也成了明代北京文化发展走向的重要内因。在汉族的疆域上战胜蒙族统治者之后,明代统治者尤其是明成祖朱棣格外重视自己政权的“汉族”性质。

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朱棣收到了两封上疏,一封是公、侯、伯、五军都督等官的上疏:“臣等窃惟北京山河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皇上营建北京,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伏乞上顺天心,下从民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天下幸甚。”另一封上疏来自六部、督察院、督御史等官:“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诚帝王万世之都。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诚诚有待于今日。臣等窃惟宗社大计,正陛下当为之时。赋进漕运已通,储蓄充溢,材用具备,军民一心,营建之辰,天实启之。伏乞早赐圣断,敕所司择日兴工,以成国家悠久之计,以副臣民之望。”^②从奏疏中不难看到:建都北京,是汉族官员夺回江山、扬眉吐气的最大功业,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期待中建成的北京新城,必然会伴随着一种执政者、胜利者、成功者的情绪,并形成相应的审美风气。

鉴于新朝新政的需要,明初统治者不断强化汉族文化。在本世纪50年代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的藏族土司家中,还保留着明成祖赐给藏族首领赏思的敕书和铜牌,三份敕书的开篇是同样的语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俺汉人地面西边……”^③可知首位入主北京的汉人皇帝是多么强调自己的汉族身份。出自宋濂之手的朱元璋《北伐告北方官吏人民檄

① 《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② 《日下旧闻考》卷4《世纪》,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6页。

③ 《百度百科网》“朱棣”词条。

文》中明确声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① 这些文字极为鲜明地体现了明王朝在中国的北方致力消除元朝的“夷狄”之风、全面恢复汉族文化传统的意志和举措,为朱元璋顺利地建立汉族政权并登上帝位提供了舆论基础。文徵明在北京凭吊文天祥的《文信国祠》诗中道“南北间关百战余,此身宗社许驰驱。可怜功业孤魂在,自决存亡大义俱。夷狄至愚犹叹服,皇天无意竟何如!平生心事堪谁诉?漫托他年半纸书。”^② 崇仰汉业而贬抑夷狄,是明代京都文化建立的一个观念起点。从区别于“夷狄”之元大都的“大汉族”观念到“大北京”心理,北京人自恃“正统”的身份意识不断地得到强化。

其次是京城的北方意识。朱棣十分重视经营北方,永乐初改北平为北京后,设行在六部,增设北京周围卫所,逐渐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军事中心。永乐七年(1409)在女真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同时争取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政府封号。此后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巩固了北部边防。永乐七年开始了营建北京天寿山长陵,以示立足北方的决心。十四年开工修建北京宫殿,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于九年疏浚会通河,十三年凿清江浦,使运河重新畅通,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其他边疆地区的统治也得到发展。十一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乱后,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为加强对乌斯藏(今西藏)地区的控制,朱棣派遣官吏迎番僧入京,给予封赐,尊为帝师。他还于四年设立哈密卫,并多次派遣陈诚、李达等人赴西域,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全国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朱棣定都北京,成就帝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元大都之威而成明北京之势。元代国势的强大超越了以往各个朝代,因此,元大都的矗立,不仅使北京地区成为北方文化的中心,也使这座古城具有了天下第一京师的含义。

朱棣定都北京,既有他作为北方领袖“燕王”的个人倾向和成为千古一帝的抱负,也是治下臣民对这座北方都城之地的众望所归。《明成祖实录》记载了朱棣建设北京的情况“北京营建,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③ 北京新都城的建筑物在“规制”上遵循南京,是汉族政权的文化延续;而在形态的高大和装饰的华美上超越南京,则带有北方的大都元素和“燕王”心愿的色彩。除此之外,从拱卫京师的塞上长城,到富丽堂皇的紫禁城,以及南北贯穿、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北京在整体风貌上与因势就形、自然布局的南京有了很大的区别。从“燕王”到永乐皇帝,朱棣在北京地区劳心费力,惨淡经营,羽翼渐丰而一飞冲天。与他突然发动“靖难之役”并由此背负骂名的南京不同,北京是他的领地,也是福地。朱棣的宿将旧臣多为燕邸、北平都司及燕山三卫所属的将校,也有与他相类似的北京情结。比如首席谋士姚广孝,经人举荐后随燕王朱棣至北京,住持大庆寿寺,经常出入燕王府。朱棣称帝后升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成

① 《日下旧闻考》卷4《世纪》,第65—66页。

② 《帝京景物略》卷1,第17页。

③ 《日下旧闻考》,第66页。

国公的朱能,初袭父职任燕山护卫副千户,守卫燕王朱棣宫邸。后从燕王征战各地;并与张玉计斩监视燕王的张昺、谢贵,为靖难之役立下首功。和朱棣一样,北京是自己的发迹之地,对北京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他们的态度和威望,都增强了北京文化中的北方因素。

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指出:“太宗靖难之勋即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都于燕,因而枕戈秣马,四征弗庭(停),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①建都于“燕”,为的是解决“北顾之虑”,原意是对北方边防的关注,实际上也造成了对北方风土民情的重视和民众之中北方意识的强化。随着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地位的确立,北京也逐渐具备了文化中心的必要元素。这里是文化政策的令之所出,包括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多种决策,也包括损害文化发展的文化专制及“文字狱”政策。在“中心”的确立过程中,国子监、翰林院等国立的文化机构形成规范,礼部主持三年一次的会试、殿试汇集天下英才于京师,重要的文化观念体现在各种活动之中,并向整个华北地区辐射扩散,使六朝以后的文化典范由江南而北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方地区文化落后的状况。不论自由多元抑或文化专制,都在观念上强化了京都文化的中心性质。

明代的京城建设使北京作为北方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强化性的物态定位。

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和元大都城相比,明北京城向东南迁移,面积大增,又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城市布局更加合理。特别是更加突出了以紫禁城为坐标的中轴线布局,使人身在北京便始终处于皇权的标准之下,帝王的威严得到了空前的彰显。

明清以还,尽管北京文化具有大都市的兼收南北、开放包容的气度,但北京人包括饮食穿着在内的风俗习惯都与南方差别鲜明,甚至还存有一定程度上的轻视南方的“大北方”的意识。这是典型的明代北京人的自我意识。《日下旧闻考》中引用了多种与北京有关的典籍,从中可见明清时期对于北京文化地理的认识。如《明輿地指掌图》:“京师形胜甲天下,宸山带海,有金汤之固。”《凤洲笔记》:“北京虽号稍东北,南与饷远。然左沧海,右太行,风气敦厚,长安之下,此其最也。”《大兴县志》:“东枕辽海,沃野数千里,关山以外,直抵盛京。气势庞厚,文武之丰镐不是过也。”^②明末孙承泽之言是为代表:

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杨文敏谓西接太行,东临碣石,钜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势拔地以峥嵘,气摩空而削削。又云: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桂文襄云:形胜甲天下,宸山带海,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太行自西来,演迤而北,绵亘魏、晋、燕、赵之境,东而极于医俗无间。重冈叠阜,鸾凤峙而蛟龙走,所以拥护而围绕之者,不知其几千万里也。形势全,风气密,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兹地实有之。……况居直北之地,上应天垣之紫微,其对面之案,以地势度之,则泰岱万山之宗正当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为极,则地之势亦当以北为极。易曰:艮者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以成终而成始也。艮为山,水为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万山皆成于北,天下万水皆宗于东。于此乎建都,是为万物所以成终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夫以北辰为天之枢,居微垣之中,而受众星之所向,则在乎南焉。今日京师居乎艮位,成始成终之地。介乎震坎之间,出

①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0。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② 《日下旧闻考·卷4·世纪》第77页、78页、87页。

乎震而劳乎坎,以受万物之所归。体乎北极之尊,向乎离明之光,使夫万方之广,亿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见。则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者,无不在于照临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也。^①

在明代文士的心目中,北京成为国都是天经地义之事。明成祖定都后的北京,就像天上的北极星。这方重回汉族统治者之手的土地从此不再是和东北西北混为一谈的泛指的北方,而是具有幽燕文化传统的最高级别的文化象征。由此生成的审美文化,一定是北方的,更是北京的。时至今日,在一般中国人的意识中,“北京人”当然是“北方人”,同时又是具有某种最高典范性的“北方人”,“京派”文化是北方文化的核心代表。这样的文化意识,主要形成于明代的北京生活以及对于明代北京的关注和认识。

三

明史一直是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新时期以来,又不断出现了许多关于明史的不同文化视角的论著。关于明代审美文化特点,例如思想大解放、视野大开阔的新时代;艺术大融合的新倾向;趣味大收获的审美风尚等等,大量的古代文献史料中都有明确的记述,也得到了艺术史家较为一致的说明,并形成了大体一致的共识。与明代全中国的审美活动相比,特别是与各地的艺术现象相比,明代北京处于一种乏善可陈的尴尬境地。似乎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史成就大多产生于北京以外的地区。比如书法中的祝允明、文徵明(嘉靖二年授翰林院待诏而居京三年)、王宠等,代表了明代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准,但皆为吴中文士,故王世贞《书苑卮言》有“天下书法归吾吴”之称。再如代表明代艺术最高成就的流派多样化的山水画、花鸟画派与人物画,四大声腔的南戏风采和以南曲为主的传奇等等。然而这些基本特点在北京审美文化中也有相对一致的表现。在特定的文化结构中,必然地发生了明代北京审美文化历史沿革的基本趋势,即深厚而开放的历史感受,官方意识与民间风情的冲突与交汇,大雅与大俗的艺术风格的极端化展现。

明代北京地区的审美文化主要有两大特征:

(1) 南北相合的审美风范。北方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特征相关联,中国南北相异又相互交融的文化现象自古而然。这一文化现象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一直存在,定都北京后的明代有延续而更有自身的时代特色。成祖朱棣建紫禁城和郑和下西洋处于同一时间段,皆证明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建北京包括:登基之初迁农民来北京开荒,从江浙等地以五年免税的优惠政策迁 3000 多户富户入京。大量江南文士入京,著名者如“公安三袁”、汤显祖、李贽、文徵明等;1409 年朱棣以巡守的名义住北京燕王府,无锡人王绂为其绘制《北京八景图》,吴工蒯祥参与紫禁城设计,松江人朱孔阳为北京宫殿书写牌额。他们带来了南方的汉族传统文化,增加了北京各种审美活动的文雅内敛、含蓄委婉的风格元素。

(2) 幽燕文化的审美心理。幽燕文化自战国时期已独具特征。《帝京景物略》中的刘侗“叙”文极为自豪地宣称“都,应垣也。燕之应极,垣有三焉,极一而已矣。日东出,躔十有二,极北居,指十有二,以柄天下之魁杓。天险设于坎,地势厚于坤,皇建而人民会归于极,有进矣。帝北宅南向,威夷福夏,玉食航焉。盖用西北之劲,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制西北之劲。饶劲各驭,势长在我。”“中宅天下,不若虎眈天下,虎眈天下,不若挈

^①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形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天下为瓶,而身抵其口。雒不如关,关不如蓟,守雒以天下,守关以关,守天下必以蓟。文皇帝得天子自守边之略,于厥初封,都燕陵燕,前万世未破斯荒,后万世无穷斯利,捶勒九边,囊括四海,岂偶哉。”“夫都燕,天人所合发也。”^①这是典型的明代北京人心态,说明了北京成为国都的必然性,也是北京审美文化的心理基础。

从审美心理生成的原因解读明代北京的审美文化,不难发现一些基本的因素:其一,地域文化造成北京人具有北方风情,燕赵豪气。游历燕京的江南文士记述了这一特点,如袁中道《过都亢》诗“断桥流水卧枯杨,千里飞沙草木黄。都亢如何称沃美?荆轲图去致秦王。”何景明《易水行》诗“寒风夕吹易水波,渐离击筑荆卿歌。白衣洒泪当祖路,日落登车去不顾。秦王殿上开地图,舞阳色沮哪敢呼!手持匕首摘铜柱,事已不成空骂倨。嗟嗟燕丹当灭身,光也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杀樊将军!”^②这方水土中积淀已久的苍凉豪迈,在明代得到不断的追寻和认同。其二,自辽金以来,元蒙文化对北京文化发生了双重作用:既有北狄游牧民族的粗豪尚武风范,又有从元蒙压制走向解放的汉族民族意识。中原地区原有的阳刚之美,往往与道德礼义原则中的君子风范相关,即孟子所崇尚的“舍生而取义”的“大丈夫”精神;而游牧民族的风尚消解了其中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中和之美,从此北京的美感更加自由而外放。其三,北京人身处“天子脚下”,这里是政治经济的中心、文化的枢纽,见多识广是人们的知识特征,也是人们的自我认识。在皇城文化规范的“北京”观念影响下,形成了与各地审美风尚有所区别的“皇城根儿”特征:

一统性。追求审美标准的整齐划一,规范,范式(北京人称为“范儿”)。《帝京景物略》卷之四《首善书院》如此说明北京建立书院的原因“天下所脉系,在于天惠民病,杂然至日,人确乎有固志耳。立司牧,立准理,立学校,所以为固也,仍听立书院讲学焉。故讲学以赞治朝之听,详辟雍之教,喻孝弟忠爱之性,涣尖利朋比之群,纂详于成业授谕。”^③自视为京师首善之地,自然有立准则于天下之义。由朝廷到文士,及至一般百姓市民,都把北京的规范有意或无意地强化、泛化,扩展到言行举止和审美活动之中。

政治性。带有明显的社会、人生的指导意味,政治性的内容。京城人接触政治高官的机会多和亲身体验政治事件的机会都多于其它地域,好谈论政治形势,并自觉地将自己接受的政治观念运用于人生规划,也必然地增强了审美意识的政治化。

高贵性。京城居民的心理中带有显而易见的自负自豪感。即使市民阶层的世俗审美活动也往往流露出京畿皇城的高贵气质。

伴随着明清以后北京文化的发展,这种审美意识有着相当稳定的延续。时至今日,我们在北京人的言行做派中,在“北京大爷”的称呼中,明代定型的“北京意识”依然清晰可辨。

(作者通讯地址:王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048)

(责任编辑 晓文)

① 《帝京景物略》,第3页。

② 《帝京景物略》卷8《畿辅名迹》。

③ 《帝京景物略》,第149页。